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刘小红^{1,2} 赵杰³

(1.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2.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3.中共盱眙县委党校,江苏 盱眙 211700)

【摘要】文章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概况为进路,对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边区政府的广泛宣传、发布法令法规、建立妇女组织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满足了抗战的客观需要、展现了妇女的伟大力量,也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妇女;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5)05-0100-08

On Women's Contribu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iao-hong¹ ZHAO Jie²

(1.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2.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3.Party School of Xuyi County Committee of the C.P.C, Xuyi 211700)

Abstract: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women participat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is paper has a history explore on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about the border regio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xtensive publicity of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distribution law and regulations, to set up the women's group have provided the important safeguard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border reg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meet the needs of the objectiv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show the great power of women, also promote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Keywords: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wome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在被誉为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辉煌篇章的“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妇女将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学术界已经从参政、教育、放足、婚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而对当时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相关论述尚较少见。本文拟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视角展开

[收稿日期] 2015-09-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女性困境及对策研究》(2014SJD159);南京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创新驱动发展”视角下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2014YB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小红(1978-),女,南京理工大学博士,南京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女性研究;
赵杰(1984-),男,中共盱眙县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史研究。

论述,以拓展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的渠道与范围,丰富这一区域史研究的内容,力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展现历史的全貌,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概况

陕甘宁边区原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是全国敌后抗战力量的指导中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评价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①。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北部,土地贫瘠,是典型的“靠天吃饭”的农业环境^②。一方面,黄土高原降雨分布极不均匀,全年雨日不足60日,其中半数集中于六七八月,加之边区河流较少,农业灌溉基本依赖降雨^③。另一方面,边区大部分耕地是坡地,耕地条件较差,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早霜较早,晚霜较晚,导致大部分地方粮食作物“年仅一熟”。

1935年,南方失去根据地的各路红军历经艰苦的长征后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并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使得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与出发点,边区人口急剧增多。人口增加直接导致的是边区粮食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这也成为困扰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要改善人民生活,满足抗战粮食的补给,首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一九四二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中指出:“自给自足经济的实现,长期抗战供给的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基本的就是依靠于发展边区人民经济,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首先依靠发展农业生产”^④。

由于长期的封建势力压迫和落后的性别文化影响,在中共中央到来之前,陕甘宁边区妇女地位低下,没有自己的权利,再加上缠足原因,她们的劳动范围也主要是家庭领域,很少有机会外出。大多数妇女受制于伺候公婆、丈夫,抚育儿女等家庭事务,传统的依赖思想比较严重。中共自成立以来就注重妇女的解放运动,在中共初期妇女工作注重阶级性、组织性和方向性。中共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辖区妇女通过积极参加政治、生产运动获得本质的解放。1940年2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发出的指示信中强调:“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的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就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⑤

中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和组织,边区政府辖区内从城镇到偏远乡村,从女红军干部到红军家属,从上至60、70的边区妇女到7、8岁的女娃娃,整个边区的妇女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更加困难的经济和生活考验,边区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毫不退缩,努力参加生产,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农业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粮食产量逐年提升,而农业的发展又为畜牧业提供了坚实基础,边区的牛、驴、羊等牲畜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都离不开广大边区妇女的努力。

①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程纯枢:《黄土高原及内地西北之气候》,中国地理学会编《地理学报》第10卷,1943年,第34页。

④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甲1内部馆存本,1994年11月印行,第269页。

⑤ 全国妇联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⑥ 张秀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她们奋力挑起了后方生产的重担,不仅从事纺纱织布、编织缝制、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等家庭副业,而且还承担比较艰苦的田间劳动。据统计,仅1939年陕甘宁边区辖区内,就有数10万名妇女参加各种类型的生产劳动,总计开垦荒地6万多亩,植树苗10万多株。”^①较1938年,1939年开荒增加了一万多亩,植树增加七倍以上,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养蚕、养蜂等生产副业所产生的成绩也非常惊人。生产成绩如表1所示。

时间	开荒(亩)	植树(棵)	养猪(只)	养鸡(只)	养鸭(只)	牲畜(只)	养蚕(席)	养蜂(桶)
1938	21000	10000						
1939	31526	72135	1665	360811	3388	3751	4706	1899

资料来源:1940年5月10日《新中华报》。

“1942年边区在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调查显示,100%的妇女做饭做针线,55%的妇女奶孩子并料理家务,74%的妇女养鸡喂猪,照料牲畜,89%的妇女参加地里的生产,培育瓜菜、玉米、摘豆角、割荞麦、抢田、收秋、送饭,个别还要砍柴担水等,11%的妇女参加打土疙瘩、点籽、担粪、锄地、背庄稼等。”^②边区妇女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因此显著提高,从而促进其摆脱了在家庭中的附属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真正的性别平等。

二、边区政府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

(一)开展广泛的宣传,消解制约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消极因素

陕甘宁边区是一块重要的农村根据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加紧了农业生产部署,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毛泽东指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

1938年《延安“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致全国女同胞书》宣誓并热忱号召广大妇女参与生产工作,将抗战坚持到底。“抗战以来,我们妇女确已尽了一部分责任,在陕甘宁边区,妇女不仅大批的卷进了参加生产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热潮,而且大批的参加了游击队和自卫军。已经参加生产的女同胞更加努力生产,还未参加生产的女同胞要时刻准备着代替上前方去的男同胞的生产工作,学习耕种,学习缝衣,学习一切能做的生产工作。”^③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明确强调,要“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如家庭工业、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种生产……。”^④

另外,边区还通过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宣传劳模精神,加强对广大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思想引领。在广泛的宣传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共涌现出300多名妇女劳动英雄和模范,她们响应党的号召,克服了各种困难,挑起发展生产的重担。比如出席边区劳动英雄大会的郭凤英,丈夫去世后,她独自照顾七岁和九岁的两个娃娃。“但她没有依赖别人,而是丢了裹脚布,用棉花嵌进脚趾,解放了小脚,带了两个娃娃上山劳动,靠自己的一双手,解决了全家的生活问题。”^⑤“妇女干部陈敏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1941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她响应党的号召,克服了种种困难,挑起了既是军人,又是妻子、母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

② 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3月8日。

③ 《新中华报》,1939年3月13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604页。

⑤ 《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解放日报》1944年1月6日。

亲的重担,靠自己种地、纺织解决母子三人的吃穿问题。”^①还有刘老婆、李凤莲等,她们是诸多农业劳动女英雄的代表,创造了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家庭与社会中获得了认同,对于实现妇女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边区还组织文艺工作者以戏剧、秧歌等形式展开生产动员,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妇女生产动员工作,如《兄妹开荒》、《夫妻开荒》等。“发动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就是加强边区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就是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是把妇女从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②

(二)发布法令法规,使妇女享有政治经济教育权利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条件都相对落后,但边区妇女解放工作始终受到中共中央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多次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明确要求重视妇女工作,“使得一向处于黑暗无权和地位的妇女们,也获得了中国今天其它地方和中国历史上人人所没有的,又为中国妇女数十年来所争取的男女平等的权利。”^③

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曾颁布的选举条例第二章第三条,“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文化、财产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④妇女们还有机会作为参议员出席边区参议会,她们在会上为实现妇女们的切身利益发表意见。同时,还有许多妇女积极担任各级政府机关的职员,妇女们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权利。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12项提案中指出:“不发动占全国人口之半的妇女群众参加到抗战中来,最后胜利是困难的,因之,怎样从厨房、闺房中使妇女解放出来,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提案拟解决7方面的问题:“(一)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妇女参议,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二)设立妇女训练班。给妇女以文化、政治、救护、卫生、生产等知识。并培养妇女干部及专门人材;(三)建立妇孺保健设备,教育妇女卫生知识;(四)明令禁止妇女缠足,贩卖妇女,抢婚等行为,保证一夫一妻制,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制度;(五)酌增女生及女工作人员津贴,优待产妇,解决妇女干部困难;(六)保育儿童,禁止打骂虐待;建设儿童防疫医疗之设置,加强保育院工作,解决医药困难,开办保姆训练班;(七)帮助抗属妇女开办纺织等工厂,推动妇女参加生产。”^⑤

妇女能否获得真正的解放,经济上的权利是其重要标准。“在边区政府的法律上,曾给了妇女几千年来所没有的权利,即是财产继承权,承认父母死后的财产,妇女也有一份,这一点和男子完全平等。”^⑥历史上曾一直歧视妇女参加劳动,视为耻辱,而边区政府鼓励广大妇女走上生产线,使妇女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定”)也强调指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⑦。“广大妇女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的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⑧

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让广大妇女在参与生产的同时接受教育,边区政府

① 张秀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② 朱德《动员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1942年12月17日,摘自《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第151页。

③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1984年,第101页。

④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1984年,第102页。

⑤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党校系统内部发行),1985年,第149-150页。

⑥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1984年,第103页。

⑦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185-186页。

不仅法令上明文规定了妇女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多方面保障妇女享受免费教育,促进女性的文化觉醒。陕甘宁边区,“过去几乎是一个没有女子教育的地方。这里的男子识字人数的百分比是:延池县2%,华池等县1%,而识字女子的数量,无论如何,是不会超过男子的比例的。”^①1937年9月,边区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指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要“领导妇女积极参加识字运动和国防教育,组织妇女识字班,唱歌班,动员青年妇女及儿童进学校。”^②很多妇女参加识字班和扫盲班后,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她们宁愿在家里和地里干更多的活,以此消除家人“学文化,耽误干活”的困惑,争取家人最大程度的支持。在绥德,“婆姨们把院里酱盆上的盖子都刷成黑色作练字用。院墙上、炕沿上、灶台上尽是画的字。邢秀英为了认字,每天不睡午觉拼命纺线,还对教她认字的雷淑云说,赶快纺完线,你美美地给我教几天。写到本本上,我打麦子的时候捎的认。”^③

(三)建立各级妇女组织和农业组织,领导和支持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1938年,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师范学校隆重召开,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健全了各级妇女组织,领导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为全面支持抗战奠定了重要基础。边区共建立了5个分区办事处,19个县(市)妇联,179个区妇联,1065个乡妇女代表会,会员约27万人^④。在边区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1937年至1939年,边区各县、乡、村普遍建立多种新的劳动互助组。据统计,1939年,妇女生产组的成员达到53126人^⑤。1938年“三八节”前夕,边区妇联决定,“为了保障抗战粮食的供给,动员广大的妇女加紧春耕运动。”^⑥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直属县妇联主任联席会议决议案中指出,要动员边区妇女积极参加边区经济建设,保证直属县妇女参加开荒、养鸡、纺织、养蜂、养蚕、植树等生产,具体数目如表2所示。

表2 1939年陕甘宁边区妇女劳动生产指标

县名	开荒地(亩)	养鸡(只)	纺织(组)	养蜂(箱)	养蚕(席)
延安	5000	30000	60		
延长	3000	20000	100		
延川	2500	20000	200		
安塞	5000	45000			
固林	3000	20000		25	
志丹	6000	55000	100	1000	
安定	1500	30000	100		1000
甘泉	2000	20000			
鄜县	500	3000			
靖边	6500	50000			
延市	250	2050			

资料来源:1939年4月22日、4月25日《新中华报》。

1939年,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指出,“目前抗战,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这样就给了动员农村妇女以必要的前提和有利的时

①《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1939年12月16日。摘自《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②《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29)》(内部资料)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3年,第46页。
 ③《绥德市的妇女儿童识字组》,《解放日报》1944年7月15日。
 ④寇雪楼:《延安市妇女运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⑤陕甘宁边区建设厅:《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第424页。
 ⑥《今年“三八节”宣传大纲》,《新中华报》1938年3月1日。

机,使中国妇女运动大踏步地深入到有最广大妇女群众的农村去。”^①边区的妇女组织在推动边区农业生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宣传党中央的妇女政策,动员广大乡村妇女走出家门和参加生产活动。正如1939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所言,“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奋斗,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②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意义分析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下,社会主体意识提升,迸发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农业生产,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赢得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同。

(一)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满足了抗日战争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割裂和经济封锁。“据统计,1941年日本集中在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八路军”^③。在世界法西斯势力偶然得势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由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且进行了疯狂的反共活动。

特别是在1941年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制定重重包围封锁边区的计划,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边区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因此,独立自主地发展边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④。再加上部分根据地连年遭受旱、水、虫等自然灾害,有些地区甚至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根据地建设面临巨大挑战。1941年5月1日,边区颁布的《陕甘宁施政纲领》强调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困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困难……奖励外来移民”。

在边区,随着众多青年男性走向前线支持抗战,或被征调(如运盐、修路等),妇女就成为边区农副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抗战初期,边区妇女就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生产,据延安等6县的统计,有妇女学习生产小组14501个,参加的妇女35594人。1938年春季,参加开荒的妇女有20600人,开荒7000垧(约合21000亩)。全边区有50%农村的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⑤。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也为边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比如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棉花、蚕茧、羊毛、畜皮等原料,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多元全面发展。可见,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和发动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不仅契合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客观需求,同时也发掘了边区妇女充分蕴藏着的巨大力量。

(二)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彰显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广大中国妇女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日军犯下的大规模南京大屠杀暴行,使“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被奸污,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害”^⑥。“我们中国的姐妹在抗战中所遇的苦难是难以形容的:日寇所过,无非是奸淫掠夺与屠杀。”^⑦日

①《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1984年,第43、49页。

②《中国妇女》1939年6月1日。

③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5页。

④《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1940年11月12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4页。

⑤邓颖超、孟庆树:《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情况的报告》,1938年5月18日。摘自《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第29页。

⑥《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76页。

⑦《延安“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致世界妇女电》,《新中华报》1941年3月13日。

军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广大中国妇女的强烈反抗,也使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当时的妇女动员工作把宣传抗日,唤醒妇女的民族意识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当时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陕甘宁边区妇女认真履行了这一神圣的民族义务,在积极支援前线与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广大妇女承担了重任。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规定,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只有用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强大的组织力量,反对敌人的侵略……中国才能得救”^①。1938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并发表宣言:“这是一个除卖国贼外,15岁以上女性都可以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战争尽管给女性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她们毕竟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发动团结起来了。她们监视外来可疑人员、小脚女人抬病人、给红军做鞋袜衣服、鼓励家属参军,这种现象随处可见”^②。“妇女在这场战争中受害最深,因此,她们不仅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对祖国的存亡更为焦虑”^③。综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如果说妇女解放运动起初都是以妇女自身解放为前提,但抗战时期,它的内涵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妇女解放运动完全维系于民族的存亡。

(三) 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主体意识提升的充分表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妇女大生产运动,提升了边区妇女的主体意识。中国共产党决定从根本上消除封建男权对女性的束缚,从提倡放足到婚姻自主,提升了其主体意识,也推动了广大边区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抗战爆发后,为了动员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积极参加抗战,参加田间劳动和社会活动,同时也为了妇女自身的解放”^④,放足,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女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的进程。“废除缠足是非常适合广大年青女性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是与女性自动要求放足的主体性心理分不开的”^⑤,也是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需要。正如当时流行的《放脚歌》所唱到,“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个女姣姣,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双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打来更是跑不了”^⑥。

1937年初,妇女们基于春耕生产的问题更是主动发声,“我们的男人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要他做什么。”^⑦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解放运动冲破了传统婚姻的藩篱,部分女性开始努力争取改变禁锢自身的不合理的传统婚姻,要求离婚。资料显示,“在边区的离婚案件统计中,有95%以上是女性提出的。”^⑧同时,由于大量正规军奔赴前线,中国共产党将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妇女组织起来,建立自卫军,以此充实与巩固边区内部建设。女自卫军在后方主要担负起协助男自卫军、准备打仗时代替男子生产等重要工作。妇女劳动英雄曹万祥曾自豪地说,“男人们能做的事,我们都能做”^⑨。

(四) 展现妇女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

①《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②刘长胜:《苏区妇女给我们的印象》,《新中华报》1937年3月9日。

③周亚平:《抗日战争与中国妇女的新觉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④《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内部资料) 陕甘宁三省区妇联,1987年,第9页。

⑤周锦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女性解放》,《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⑥刘 御:《小脚婆姨》,《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

⑦刘长胜:《苏区妇女给我们的印象》,《新中华报》1937年3月9日。

⑧《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内部资料) 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1984年,第376-377页。

⑨《本市杨家湾居民成立妇女自卫军、女变工队积极帮助男子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会变革。”^①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②。中国历史上，广大妇女的生活长期被限制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领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们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不仅遵循了革命的行动逻辑，也争取到了经济独立、婚姻自主、参政等权利，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得以实现，男女平等成为社会现实。

妇女解放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工作，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参加劳动能够唤起妇女自身的觉醒，激发她们独立自主的意识。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也彰显了妇女独立生产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也驳斥了传统的“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等错误思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使边区妇女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拓宽了视野，她们从以前的足不出户忙家务逐渐转变为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男人这样称赞道：“咱们过去常看不起妇女，总说女人们不能做事情，如今看起来，妇女顶大事哩。”^③

四、结 语

在边区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妇女们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她们成为支持后方农业生产建设的潜在力量，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④

诚然，陕甘宁边区妇女还没能够完全走出传统文化习俗的樊篱，部分妇女解放意识缺乏，影响了妇女解放的进程。尽管如此，陕甘宁边区妇女对农业生产的历史意义依旧不容忽视。广大妇女作为边区生产和抗战的一支生力军，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同，也促进了自身的精神成长，重塑了中国妇女的新形象。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七大工作方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3]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陕甘宁边区史纲[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 [4] 全国妇联编.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妇女运动史[M]. 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9.
- [6] 寇雪楼. 延安市妇女运动志[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① 全国妇联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9页。

② 全国妇联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

③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内部资料) 陕西省妇联运动史小组编印, 1984年, 第477页。

④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1939年3月3日。摘自《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